

云冈石窟浮雕塔形浅议

□ 张 华

北魏时期以“佛塔”形象作为佛教艺术的造像题材，并成为重要特征之一。云冈石窟中的佛塔造型丰富多彩，不仅雕有高大的中心塔柱，而且镌刻有众多的浮雕塔。经调查现存有120余座，大多位于洞窟窟门和佛龕两侧的壁面之上，不仅显现出当时的造塔信仰，而且简洁凝重，极富装饰韵味，折射出北魏佛塔的建造特征。

一、云冈石窟浮雕塔形的表现形制

塔是云冈石窟中晚期造像题材中的重要内容。其多雕于壁面佛龕两侧，或是起装饰补白作用。从其形制来看，主要分为三种：即屋檐楼阁塔、层柱塔和覆钵塔。

1. 屋檐楼阁塔：即以中国传统的重楼屋檐结合印度、中亚所传入的塔形构成的建筑。楼阁式塔最早在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就已出现。《三国志·刘传》载：“笮融者……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1]。记载中即很显明地是说明运用木结构的重楼作为建筑主体，这可称得上是中国楼阁式塔的萌芽。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皇兴元年（467）平城的永宁寺塔“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其形制为高三百余尺的七级塔。皇兴年间（467~471）的天宫寺塔“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2]。其形制为高十丈的三级塔。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明帝熙平元年（516）的永宁寺塔，据《洛阳伽蓝记》载“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3]。此塔为方形木结构楼阁式塔，平城永宁寺塔的七级重层也亦为木结构楼阁式塔，虽遗迹无存，但这些文献仍是我们研究北朝佛塔式

样宝贵的参考资料。现从北魏石窟中可直接看到的式样——屋檐楼阁塔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塔建筑。

云冈石窟所见的石雕浮雕楼阁式塔中，多数表现在窟内，仅少数镌刻在窟外壁龕之上（一般出现在晚期窟），龙门石窟多出现于外壁，保存较好的是莲花洞外壁和药方洞北壁上。云冈壁面上的浮雕塔形，其基本的形制特征，见不到印度桑奇、巴尔胡特大塔的形式，已变为中国式的佛塔，即塔基、塔身（中国仿木楼阁式）和塔刹（印度、中亚的基本元素构件^[4]）融合构成。云冈石窟的中、晚期均可见到，出现于第一、二窟的东壁、第五窟南壁明窗东西侧、第六窟周壁及第十一窟南壁、西壁、第十四窟西壁等等。

第一、二窟东壁 屋檐楼阁塔在云冈最早出现于此两窟的东壁。第一窟东壁四佛龕之间浮雕有三座楼阁塔形，现仅存中部和南部的上层部分和塔刹。塔刹均为三刹，有“相轮”和“宝珠”，但中部的塔刹出现“承花”；第二窟东壁四龕之间浮雕三座五层楼阁塔，每层均为一佛龕，逐层减窄减低，每层的两柱头直承屋檐，无斗拱铺作，屋檐翼角悬挂“流苏”。塔刹为单刹，但与第一窟东壁的不同，其塔的基本构件“覆钵”、“基坛（刹座）”、“刹柱（伞竿）”、“相轮（伞盖）”和“承花”等都集中在刹顶上，并在刹柱上出现了飘扬的“幡”。

第五窟南壁明窗东西侧：五层屋檐楼阁塔采用高浮雕镌刻，塔形的特征更为清晰。此两塔均驮于大象之上，塔基为须弥座，塔身自下往上逐层减窄减低，塔身佛龕是尖拱龕，为二龕或三龕，瓦葺形的屋顶。塔刹为高耸的单刹，基坛为须弥座，刹柱用七层相轮来表现，刹顶装饰有宝珠。

第六窟周壁 窟内东壁、南壁和西壁佛龕间配置浮雕有十座五层屋檐楼阁塔,这些塔形雕饰华丽,建筑技艺精湛,在此窟表现出很高的水平。塔基均为须弥座,塔身每层屋檐翼角都悬挂有“流苏”,塔身佛龕为尖拱龕和盂形龕。塔刹为三刹,刹座为须弥座,刹部有承花、覆钵、相轮和宝珠。

第十一窟:为云冈石窟中雕刻浮雕塔形最多的一个洞窟,可以称为“塔窟”。但各壁面浮雕的塔形不规整,佛龕与塔的配置无秩序。

西壁中层西南角的七层楼阁塔,塔基为须弥座,塔身的面阔和高度递减,塔身佛龕除三层为二龕外,其余每层均为一龕。第二层至第七层屋檐翼角悬挂“流苏”(第一层未雕饰),屋檐正脊两端均雕饰有鸱尾,檐下无斗拱铺作,但檐下的枋长而厚,并每层翼角处都有斜搭的椽子。塔刹为单刹,刹柱高大。

南壁明窗东侧的三层楼阁塔:塔基为素方台基,塔身每层的佛龕各不相同,第一层为尖拱龕,第二层为盂形龕,第三层为尖拱龕。每层的檐下雕有斗拱铺作,瓦葺形屋顶。塔刹为单刹,覆钵上刻有化生像,承花的雕刻与第十二窟前室门拱两侧的式样相同,刹柱上饰有幡。

第三十九窟门拱东侧 雕有三层屋檐楼阁塔,塔基为高大的素方台座,塔身的每层比例不均衡,第三层接近方形,屋檐下雕有人字拱,正脊两端为鸱尾。塔刹为单刹,刹座为须弥座,简单的覆钵上承托几重相轮和宝珠。

2. 层柱塔:它是由几层长方形直檐状(或板状)所构成的层柱式的塔形。每层的直檐是长方形,不是瓦葺形,故在表现建筑的概念上,也可认为其是“柱”的说法。梁思成认为其上无相轮,疑为浮雕柱的一种^[5],但云冈石窟出现的这种建筑造型,因其特征与在石窟壁面上所起的作用,与其塔制的建筑表现上仍有共通之处,所以依照其构造,姑且仍可以为浮雕塔形的一种。云冈石窟层柱塔,首先表现在中期洞窟的第七、八窟后室东、西壁面,其次在第一、二窟西壁以至第九、十窟前室。

第七窟西壁:第四层两龕之间配置浮雕有三座四层层柱式塔形,每层内为二佛并坐,柱顶饰一承花,下部为一力士承托,别具趣味。

第九、十窟前室:第九窟西、北壁和第十窟东、西壁和北壁明窗两侧屋形龕内均浮雕有四层、五层层柱塔,起到“柱”的效果,洞开三间。层柱塔每层也均自下而上逐层递减,下部有的用一力士承托。

3. 覆钵塔:为表现印度中亚的原始造型。最早的造塔起源于印度,关于早期覆钵塔的形制,在小乘律典《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十八)记载“应可用砖两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钵,随意高下。上置平头,高一二尺,方二三尺,准量大小。中竖轮竿,次著相轮,其相轮重数,或一、二、三、四,及其十三,次安宝瓶。”现存最早的造塔遗址,例如桑奇地区一号塔,原型也是覆钵式,以此推测早期的造塔形制均为覆盖半球体状的覆钵塔形。它是由基坛、覆钵、刹柱和相轮组成的实心建筑物,这是早期塔制的特征和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后来传入中国后,这些构成要素就安置在塔顶上,这种高耸的标志,称为“刹”,既有宗教意义,又对塔起了装饰作用。另外,在吐鲁番、敦煌、酒泉发现的北凉石塔,对我们认识早期塔形的特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旁证^[6]。

云冈石窟浮雕覆钵塔的形制并不多见,出现在云冈晚期雕刻中,第十一窟西壁、第十三窟东壁和第十四窟西壁等,所表现的式样和形制与原印度式覆钵塔不同,实为单层塔的表现。

第十一窟西壁:塔基为须弥座,塔身为二佛并坐龕,塔刹为三刹,承花之中的覆钵硕大,整个塔刹高耸,刹柱上的装饰为重叠的相轮。

第十三窟东壁:塔身佛龕为圆拱龕,无塔基,塔刹为单刹,承花之中雕有化生像,刹杆上未雕相轮。

第十四窟西壁:素方塔基,塔身佛龕为尖拱龕,内为一坐佛,塔刹为三刹。刹顶的刹柱和相轮比例稍小,承花之中的覆钵较大。比较有特色的是在覆钵体上方的基坛上又出现了承花的装饰。

二、云冈浮雕塔形的基本特征

1. 云冈浮雕塔形,其基本造型的建筑特征,表现了实际的造塔式样,即为四面塔制。在北魏塔的形制中,可知方形的四面塔是主要的造塔规格,例如北魏天安元年(466)曹天度造千佛方塔^[7]和太和二十年(496)曹天护造塔^[8]和山西羊头山北魏造像塔^[9]以及云冈石窟第一、二、六和三十九窟等的中心塔柱,均为方形四面的形制。因此从这些塔的形制,约略可以看出北魏造塔平面多限于方形一种,是当时塔的普遍形式。

印度笈多时期的覆钵塔台基为方形结构,如古雅拉特的德夫尼莫里,这座塔建于4世纪末,台基为方形,台基上有小方台,再向上是覆钵丘;辛德附近

的米尔普哈斯,建于五六世纪,台基也为方形。方形台基是笈多时期塔的普遍形制,是仿犍陀罗覆钵塔建造的。犍陀罗的塔,台基大多方形,台基之上是圆柱形塔身,塔身之上为覆钵丘,迦腻色迦大塔以及罗里延唐盖出土的供养塔,台基均为四方形^[1]。所以云冈也可推断是仿犍陀罗覆钵塔方形台基雕刻的。

2. 塔的层数,佛教以奇数为上,因而云冈浮雕塔的层数也以奇数为多。云冈多见3层、5层和7层,第七窟西壁、第九窟西壁和第十窟东西壁的层柱塔为4层(偶数);仅有的覆钵塔为1层(第十四窟西壁等),也可称为单层塔。不过云冈以7层塔居多,人们常称塔为“七级浮屠”,可见7层的塔更为常见。据史料记载,当时平城的寺塔最高的是永宁寺七级浮图。《魏书·释老志》载:“永宁寺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可以认为,云冈第五窟的五级浮雕塔、第十一窟的七级浮雕塔以及其他洞窟的3层塔均是写实的。

3. 浮雕塔形的各层面阔和高度,向上逐层递减,与云冈中心塔柱一样,也与实物塔制一致。如北魏的曹天度千佛石塔,该塔建于一个石雕台基上,共分9层,塔身自下往上逐层减低。云冈石窟浮雕塔的式样和北魏时期的实物塔具有相似之处,也与后代一致,这对唐以后的造塔形制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

4. 浮雕塔刹的装饰表现:

(1) 云冈塔刹的“覆钵”为纯粹的装饰性。表现在洞窟壁面上,也是当时造塔式样的重要组成部分,覆钵塔的形制中覆钵体积比例较大,与原始造塔的式样有相似之处,在印度桑奇覆钵塔主要有三个,“覆钵”体在塔制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表现在中期洞窟屋檐楼阁塔的“覆钵”体积的比例就相对减小,突出表现了刹柱的高度和相轮的级数,覆钵体反而显得不重要了,甚至在第五窟南壁塔形中覆钵没有表现出来。

(2) 云冈塔刹的基坛(覆钵体下方之台座统称为基坛),形制几乎为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须弥座,也就是5层叠涩结构,这在云冈浮雕塔中很盛行,有的连总高度也超过覆钵体,这就使浮雕塔形的塔刹变得更为高大。早期印度桑奇和巴尔呼特出现的覆钵塔形基坛只为1层,高度也不高于覆钵体。

(3) 云冈刹柱和相轮:刹柱一般是直接插在覆钵体上,也有的直接插在基坛上,如第二窟西壁层柱塔。关于刹柱出现在塔刹上的数目,云冈为单刹(一根刹柱)和三刹(三根刹柱)的装饰表现。相轮是佛

教语言,又称九轮、金刹等,是耸立在塔顶的表相,我国早期常把相轮称为承露盘^[1]。云冈塔形中刹柱和相轮的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一是刹柱的粗细几乎上下一致,相轮的宽度比刹柱大得多,并层叠在下部,如第五窟南壁;二是刹柱柱宽变细长,相轮的宽度也相对缩小,如第六窟周壁塔;三是刹柱为下宽上窄,相轮随刹柱的宽度由下往上递减,宽度和刹柱宽几乎相等,如第十一窟南壁上层东部。

(4) 云冈刹柱顶端的“宝珠”:又名“摩尼宝珠”和“如意宝珠”,此珠好似聚宝盆。宝珠常在塔刹之顶,一般为1个,变式的有3个至9个,大小不等。云冈为1个,只是宝珠的形状略有不同,如第五窟南壁东塔的宝珠是略带尖端的椭圆形状;第六窟周壁的为尖橄榄的长椭圆形状等。

(5) “承花”又名“受花”或“山花蕉叶”,“山花蕉叶是佛教的一种装饰,在印缅一带佛教建筑佛龛上常见此物……”^[2]。云冈石窟所见的层柱塔上部的承花面积很大;但承花与覆钵体结合雕刻时,承花的面积逐渐减小;表现在覆钵塔形时,承花的面积更为微小。尤为具有特色的是云冈第十一窟南壁东侧和第十二窟前室北壁拱门柱出现的一种特异的承花式样,其造型类似阶梯状的式样,此型在敦煌莫高窟第254窟和第257窟等壁画中也可窥见。

(6) “幡”本不是佛教所专用,早在佛教传入以前就已经有了此种装饰物,一般称之为信幡、幡帜或灵旗,相当于旗帜的作用。在佛塔上悬挂幡是作为供具以求佛佑。云冈第二窟东壁、第十一窟西壁和南壁上层东部楼阁塔刹柱之上等处均有幡,表现的不是很多,但其造型却不雷同。

(7) “化生像”雕刻在云冈浮雕塔刹部,出现在面积广大的承花之中,是层柱塔最突出的装饰表现,如第七、八窟等,其次表现在屋檐楼阁塔和覆钵塔塔刹上,但化生像很小,没有层柱塔中显要。化生像表现在云冈浮雕塔形中,这在云冈中晚期洞窟中相当盛行,而迁洛后雕凿的龙门石窟则表现不多,由此可见云冈石窟造塔的特色。

云冈石窟浮雕塔形,真实地反映了北魏佛塔的式样,可以作为平城地区造塔复原的直接史料,也可作为中国建筑史上珍贵的参考资料。

[1]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十九《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中华书局出版,1959年12月。

[2] (北齐)魏收撰《魏书》(八),卷一零八至卷一一四(志),中华书局,1974年6月版。

[3] (北魏)杨炫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科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6月。

[4] 佛陀跋陀罗译《摩诃僧祇律》卷33:“下基四方(基坛),周匝栏楯,圆起二重,方牙四出(覆钵塔身)。上施宝盖(平头),长表轮相(伞竿、伞盖)”。(见《大正藏》第22册)。这记载中的基本要素构成覆钵塔形的形制。

[5] 参见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国营造学社》1933年第3、4期。

[6] 王毅《北凉石塔》,《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第1期。

宿白《凉州石窟与“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7] 史树青《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文物》

1980年第1期。

[8] 陈炳应《北魏曹天护造方石塔》,《文物》1988年第3期。

[9] 张驭寰《山西羊头山的魏唐石塔》,《文物》1982年第3期。

[10] 见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11月。

张宝玺编著《甘肃佛教石刻造像》,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3月版。

[11] 《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虎于临漳修治旧塔,少承露盘。澄曰: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

[12] 张驭寰《山西砖石塔研究》,《山西文物》1982年第2期。

(作者工作单位:大同市云冈石窟研究室)

栏目主持/赵曙光

中国古代书画精品选登



清 吴历 南泉松云图 水墨纸本 立轴



清 吴历 山村树密图 设色纸本 立轴



清 吴历 仿王蒙山水 水墨纸本 立轴